的历史斗争。在这种情况之下，指责媒体排除有色人种、按性别划分人群显然证据不足，因为民族、种族和文化差异常常是电影电视中美国的现实状况。但是我想指出这种差异在媒体中的广泛化（包括媒体研究和媒体行为主义）可能加强我们描述的停滞状况。说它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想重复讲述邪恶资本主义或者非真主体，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有色人种、同性恋、女性、各种其他社会差异的表达方式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我所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媒体研究应该关注的，是在当前异质标准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差异如何被用做权力技术来强调男性、白人、异性恋才是真正的标准。所以在我的媒体研究中，差异（以及差异广泛化）作为权力技术是新自由主义文化经济中媒体研究的中心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审视媒体研究中一些关键词汇，这不仅仅包括从新角度看传统词汇，而且要把它们重新概念化，从而认识我们是如何感受并经由其构建世界，它们如何在物质世界中与结构的平等或不等相联系。在我们的媒体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这样一种媒体研究：它能够对权力的形式和结构改变作出批判分析，能提供多种不同身份，能对把新数字移动技术下对文化社会调和的思考运用于社会正义。这个期望不高，但执行起来却又极具挑战；在这种媒体研究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它要求我们在新学科、新社会关系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迅速产生的全球范围内批判地思考媒体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问题多过我们所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新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研究这些构成媒体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译者：陈志强

文化断裂与文化韧性

□张隆溪

在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语境中，“断裂”似乎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用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也是许多当代批评家与理论家对“文化断裂”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断裂”集中反映了Jean－François Lyotard所描述的后现代的特征。文论的主要趋势是质疑语言的效力、意义、表达与交流。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核心理论围绕着不可读性与不可确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文本与文本性的自我解构等概念展开。事实上，对语言的批评以及对语言交流功能的

怀疑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生产物，因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讲到的那样，对写作以逻各斯为中心的贬低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早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初就已经对语言的不足性作过哲学阐述。但是，现在对语言的消极性与交流的断裂的极度关注现象确实很新，形成了后现代理论的大前提，同时与传统文化来了一个彻底决裂，古典合法化元叙事 (metanarrative) 衰落了，或者说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启蒙时期思想意识断裂了。

詹明信在他的一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将断裂作为当今时代的符号，是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詹明信的解读，拉康的精神分裂概念作为表意链的断裂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精确幻觉，从语言心理学方面分析了文化断裂这一当代、后现代、后结构时期的文化特征。詹明信说："当表意链断裂，这层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就患了以一系列个性鲜明、互不关联的能指的形式出现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心理与不连贯的能指成了指代当代文论中关于"过度发达"、高度隔离的当代社会中主体"死亡"、个体消失、破碎的"去中心"心理等概念的最好比喻。因此后现代断裂既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正如语言的不足性由于打断了表意链中的连接，既影响了个人也影响了集体。E. Ann Kaplan 从"福柯 (Foucault) 的"知识"理论 (spisteme)，库恩 (Kuhn) 的"范式"理论 (paradigm) 给出解释，也将后现代看做是一种文化断裂：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产生的断裂，此处现代主义指 19 世纪浪漫主义与现今文化场景之间的过渡期。"从历史上看，这个文化断裂主要是 20 世纪的特点，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以及之前的所有西方传统越来越彻底地断裂开来。

我们也许会想到福柯在《事物的秩序》，或译做《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的结尾发表的著名宣告："人并不比生活、语言或劳动高级多少；人类科学直到 19 世纪才产生，自那时起，现代知识 (spisteme) 突然把人作为高级生物，人类的心理、经济、哲学成了三大基本范式。因此知识考古学揭示了一点：'人是后期的产物。而且人可能已经正在走向终点。'"福柯在他的书中来了一个预言性的结尾，并转到了范式理论："我们当然可以打赌人类将会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人脸一样。"我们也会想到德里达 (Derrida) 有关人类终结的讨论："人，根据这个字本身含糊不清的意义，始终与他的结局相联系"。随着形而上学的结束，人也会走到他的终点。确实，断裂似乎成了描述后现代的合适词语，这个时代充满了文化与历史意义上的破碎与根本不连续性。

François Lyotard 在一篇有关后现代时期知识的报告中显示了传统的价值观是如何完全断裂的，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期，"学生、国家，或高等院校"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有关真理的讨论，而是有关事物的功用，"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已被"这个可以卖吗？""这个有效吗？"等问题取而代之。当人们用经济学术语"可卖性"来计算效率与功用时，大学以及大学产生的知识都经历了一个根本变

化。可以卖的知识与市场上的其他东西一样成了一种商品，这个概念对高校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我们中的人文主义者也许会对后现代社会的这种新现象感到沮丧，但这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可卖性、高投入产出比、收益回报等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看到此次由美国引发的并扩散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崩溃，也许正是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后现代概念的时候了。

在西方文论中，彻底的断裂现象往往反映在当代讽喻的复兴中。正如 Jameson 所说的，对讽喻的复兴或重新改造是后现代文化与理论的征兆，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断裂与不连续性、混杂多样（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区别而非趋同的敏感性，对差距、漏洞而非严丝合缝、连续叙事的敏感性，对社会差别而非大一统的宏伟工程的老教条与具体的普世观念相互映衬的社会的敏感性”。讽喻不是存在于其自身，反映自身的话语，相反它揭示了事物的更高秩序，这种秩序不直接存在于讽喻文本中，讽喻中总是存在对直接表现的不可能性的自觉意识，它只是一种对存在与文本本身意义之外的东西的间接的、经过调和的再现。讽喻的意义存在于表意的另一面，因此在符号与符号指代的意义之间总存在着意义偏差，只有通过解释与揭露才能填补这个意义偏差。同时也正是这种意义偏差与不连续性，这种对阐释的自觉需要，才使讽喻成为后现代批评最喜欢的修辞方法，它很好地体现了断裂这个概念。

在这里我并不想对讽喻以及它在后现代修辞学中的复兴之间的辩论作过多探讨，因为也许能否将讽喻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断裂的特征本身已是争论未决的事宜。我将简单举几个这场学术辩论中的代表观点。例如，Joel Fineman 称讽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方法，而是“修辞中的修辞，是所有语言比喻性的代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距，相应地，对讽喻的回应成了批评行为本身的代表。” Walter Benjamin 对讽喻作了更广义的界定，他说道：“讽喻不是一个好玩的说明技巧，而是一种表达方式，正如说话、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一样。”对 Paul de Man 而言，讽喻完全基于形象或是一系列的形象；它指出了所有语言的状况，所有文本性的结构概念。De Man 在读完卢梭的作品后得出一下这个结论：“所有文本的范式由形象（或一系列形象段）及其解构组成。”他将讽喻视做所有文本“不可读性”的表达，因为讽喻“总是隐喻的讽喻，因此是不可解读性的讽喻——所有格‘……的’本身也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隐喻。” J. Hillis Miller 肯定了 de Man 的观点，他认为讽喻说出了任何语言都在表达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语言不可读性这个不是真理的真理：“这个文本内部的不可读性正是所有文本的‘真正意义所在。’”批评家用讽喻这个文论术语来指称自我解构的文本性，它因此成了语言本身的同义词，成了后现代文化断裂的虚影。真如詹明信所说的，讽喻作为一个后现代概念，“是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两个时期断裂的要求，讽喻在这个断裂中变得更加活跃。”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后现代理论本身成了它试图分析的例子：新的讽喻结构是后现代的，而且没有后现代主义本身这个讽喻，讽喻也没法得到表达。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文化断裂的讨论似乎更多存在于较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当然这种讨论也有其真实的社会寓意与影响。从社会与历史层面上看，尤其在对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后现代断裂彰显在对传统、经典，以及许多根本观点与价值观的辩论中，这种断裂在高校课程与准则的变化中显得尤为突出，毕竟，这一点是 Lyotard 在有关知识的报告中最为关注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中国，看看历史现实中的文化断裂，这种断裂无论在社会现实还是理论批评中都有很大不同。在 20 世纪的中国至少发生了两次彻底的“表意链的断裂”，它们的强度也许比西方从浪漫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断裂还大得多。

第一次断裂发生在 20 世纪初，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辱后，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些西方来的观点不仅新，而且开始挑战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基，尤其是儒家学说。传统与现代不仅相互抵触，传统派与激进派甚至将两者间的对立上升到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对前者来说，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意味着保全中国这个国家，或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义，但对改革派来说，改变旧有的价值观才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前提。在 20 世纪早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效地改革了中国文化，包括白话文替代古文成为写作媒介的转变。它引进了科学、民主两大口号，与皇帝统治的传统中国抗衡。那时，与传统的决裂到处可见，这种挑战也许在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挽联（《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得到了最好体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五四运动标志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文化断裂，自从 20 世纪初就给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影响。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断裂较之第一次更彻底，更有毁灭性，因为它的影响更广泛，而且是自发地、有意造成的与传统及文化——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化——的决裂。1966 年至 197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有其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但无论其背景有多复杂，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场断裂比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思考中的任何一种意义的断裂都更彻底。虽然名为“文化大革命”，但其更恰当的称呼也许该是“反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发动全中国人民去反对所有文化：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封建的”，所有的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来的文化是“修正主义的”。也就是说，所有文化都是坏的、有害的，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是“毒草”。唯一留下的是对当时由《人民日报》及其他官方报纸垄断的那个时代的顶礼膜拜，这些报纸

无一例外都引用毛主席的指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被看做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与文化都被当成了错误。一看下面的这些情况，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全国人民都处在革命热情高涨与自我陶醉中，有一段时期里，全中国的书店只卖一本书——毛主席的著作，整整十年里，教育在中国这样一个素来强调学习与教育的国家里消失了，因为所有的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都关闭了，所有的学生都被送到农场或工厂接受"改造"，也就是肃清先前吸收的除了毛主席作品之外的其他所有书的"毒草"。人们担心保留任何传统的或老的东西：书烧了，瓷器、古玩砸了，那些被批为"走资派"的当众被侮辱，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精神毒害者"，他们被批斗，甚至打死，很多人自杀了。这是一个疯狂、暴力的年代。文化与传统毫无例外地被彻底打破。

当然，像这样的社会极端反常不可能持续，梦魇终将结束。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中国逐渐从自发的意识冲突与经济的全面崩溃中走回正轨。在过去的 30 年里，尤其是最近的 15 年，我们目睹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效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在文化层面上，令人惊讶的不是断裂，而是那些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谴责、根除的价值观的回归。30 多年前，孔子连同中国传统文化被一起打倒，今天不仅讨论《论语》的书成了畅销书或商业成功案例，而且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资助成立孔子学院来发扬中国学。所谓的"国学"很受百姓欢迎，成了一种时尚，其具体概念不大说得清，是集古代经典、历史或一切与传统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为一体的杂谈。甚至宗教也卷土重来，每年的道观、寺院里都是馨香缭绕。当然今天的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社会"大不相同：商业化与部分市场经济使我们很难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如何能与一个以利益追求占主导的社会环境相适合，一些传统道德原则正在瓦解。但是，除去这些因素，现实表明文化与传统不可能简单地被人为地破坏，彻底地消除，在文化断裂中被压制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反弹，甚至以双倍的力量、韧性弹回来。

事实上，相比激烈的"文化"或"反文化""革命"，文化传统的韧性留给我们更加深刻的印象，更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尤其在与文化断裂进行对比后，我发现把文化韧性作为概念与历史现实进行反思的很少，更别说是这方面的严肃的理论著作。考虑到中国与后现代西方社会状况与日常经历的差别，也许从文化断裂的反面—文化韧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化断裂这个概念，建构理论框架更加有益，这使得我们从个人与社会经历这两个角度更好地理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变化。当今这个时代以及造成那样一个过去的原因。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译者：潘小英